

# 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路 及其中国化适用路径

张美玲 张富国

**摘 要:**“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出现源于对现代性理念和现代化运动的负面效应的愤然不满和激情批判。它通过对现代性后果的反思与批判,揭示了西方社会对人的总体化统治带来的人的异化、文化的异化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紧张状况的根源。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兴起是对现代性反思与批判的成果,而深入考察二者之间可能的对话互动关系,剖析其中的利弊得失,可以从中探讨社会历史研究与形式研究相统一的一般规律,这对中国构建和谐社会有重要的社会实践意义。这种规律不仅是对人类的普遍规定性作出了验证,而且也为展开二者之间对话提供了有利条件;而这种对话最终必将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创新和理论繁荣。

**关键词:**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路;中国化;路径

DOI:10.16059/j.cnki.cn43-1008/c.2015.04.017

近年来,注重对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的追踪研究,相对忽视从卢卡奇到阿尔都塞的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哲学领域占有重要地位。自20世纪80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被整体性地介绍到我国以来,就引发了关注,并正式成为一个全新的二级学科,这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和哲学建设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但到目前为止,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建设之间还没有形成良性互动关系,主要原因一方面在于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的研究方式和价值立场还没有从根本上转向服从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建设上来;另一方面则在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缺乏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观点的必要了解和科学定位。为此,本文有必要对此进行相关研究,以促进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中国化的良性互动关系的发展。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要由哲学理论和批判理论两大部分组成,这两大部分对当代中国均

具有正向功能:哲学理论有助于我们正确地领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精神”,这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建构以及为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提供强大的思想武器和理论基础;批判理论则提醒我们在社会经济转型的特殊时期,正视和充分认识现代化事业中所出现的问题,自觉地趋利避害,将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负面效应予以批判,并将之变成推进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大动力。因此,从这一角度来看,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的转向及其现代性批判,这将有助于自我形成权衡取舍的广阔视野,理清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的问题与成就,有助于中国哲学领域吸取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华。

## 一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的两种路向维度

20世纪中末期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路径经历了从“高潮——低潮——渐趋复兴”的曲折发展过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出现源于对现代

作者简介:张美玲,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博士生/张富国,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吉林长春,130024)

基金项目:国家软科学项目(2012GXS4D079)

性理念和现代化运动的负面效应的愤然不满和激情批判。目前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已大大突破原有若干派别的范围或框架,呈现更广阔视野。早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学院化的学者为主体,以一种标榜“中立”的立场,运用“文献学”研究与“文本解读”相结合的方法来解读马克思主义思想,从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解释路向,这些新的解释路向影响了一大批研究者,也造就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诸多流派的产生。比如,卢卡奇与法兰克福学派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虚假意识”理论的内涵,提出了社会批判理论,完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研究的认识论转向;而阿尔都塞、齐泽克与詹明信则着力于意识形态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深入探讨马克思“观念上层建筑”的内涵,它们的积极贡献对推动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完善与转向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sup>①</sup>以柯尔施等人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开辟了对马克思哲学的新的解释路向。他们确认了马克思哲学超越了近代哲学而属现代哲学;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反对把主客体关系作为哲学基本问题;马克思哲学反对旧哲学和旧本体论,但其本身又是以存在论为基础的本体论哲学,是一种以主客统一为特征的实践哲学。

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对马克思的主客统一为特征的实践哲学理解存在着主体论和反主体论两种路向。这两种路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具体解释存在着差别,但总的来看,它们都强调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价值功能。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的两种路向直接导致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两种研究范式的产生:思辨范式和析范范式。在西方哲学发展中思辨范式长期占据主导地位。19世纪下半叶,诸多哲学流派开始转变先前的哲学研究范式,即向实践哲学或文化哲学范式回归,这一转向也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转向奠定了基础。其中,卢卡奇将人的生存境遇的现实文化的批判与人的自由和创造性的文化价值进行了高度的统一,从而开创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辨范式的“文化转向”。<sup>②</sup>析范范式特指上世纪70年代兴起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思潮,相应地,前者泛指一切非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学派。此时,西方学者着力于全面审视马克思主义理论,他们试图还原马克思

主义宏观理论背后的微观机制,以重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概念。尽管这种方式与传统方法存在巨大差异,但它是在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话语背景和理论传承中展开的。20世纪80年代,随着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兴起、苏联解体和东欧的剧变,西方马克思主义正在经历着一场痛苦的理论转向。如果说,由“冷战”和1968年的“巴黎风暴”所提供的思想资源已经被以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研究文本所耗尽的话,那么,正是上面所提到的七八十年代以来的新的历史情境和格局的形成,为已经衰弱不堪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神经的重新兴奋注入了巨大的动力。事实上,从那个时期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阵营中的一些前卫性的学者已经开始结合时代的特征,以全新的方式研究并阐释马克思主义了。换言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已经悄悄地改弦易辙了。<sup>③</sup>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这些转向在归根结底意义上都是历史认识论转向的结果,它们涉及历史叙事的主体和客体、历史性(过程)与共时性(结构)、内容和形式、实体和话语四种基本关系。在这些关系上,主流马克思主义坚持了客体、历史性、内容和实体的路向,西方马克思主义则转向主体、共时性、形式(结构)和话语。具体而言,虽然这一时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的观点各不相同,研究方法各有差异,但诸流派都是在马克思主义生存论的基础上来阐释并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他们一方面扎根于西方哲学的传统之中,同时又颠覆了西方哲学的本体论传统,并在马克思生存论的基础上,专注于以现实人的生存为目的的理论探究。

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意义在于规定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论宗旨及其理论主题,这无疑限定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轨迹。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历了研究立场和研究主题的转向,后走向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现代化,这种转型毋庸置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血液。20世纪90年代初,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一度处于沉寂,但自90年代中期起,在西方世界,掀起了一股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热潮,把20世纪西方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马克思主义哲学在20世

①叶险明《马克思超越“西方中心论”的历史和逻辑》,《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1期。

②黄晓波《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维度》,《教学与研究》2010年第9期。

③刘莉《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演进和裂变逻辑》,《教学与研究》2014年第10期。

纪西方世界的历程有着许多自身的特征,可以把这些特征归纳为曲折性、坚韧性、多样性、开放性和现实性。因此,本文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两种路向范式的转换成为20世纪文化批判的重要理论资源,尽管其自身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局限性,其宽广的理论视域和丰富的思想内涵,对于拓展和深化我国当代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同时,也是解决世界和平与发展、构建和谐世界的重要途径。

## 二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性批判维度

当代世界的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研究从来没有、将来也不可能与马克思主义完全斩断联系。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现为早已疲惫不堪的学术理论界和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提供了新的生命力,通过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新解读,不但批判了当时的庸俗西方马克思主义,而且恢复了辩证法应有的地位,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性保留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思想;这凸显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遭受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无情的批判,彰显了人类对解放资本主义社会的价值诉求,而且还对社会主义实践作出了极具启发性的探索。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究其本质而言,是“西方”这一范畴在政治语境中与“资本主义”的重合的产物,二者相互影响,不能剥离二者的耦合关系。<sup>①</sup>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现了由人的物质生产及其矛盾运动规定的历史的理性,批判了理性的道德功能,在社会历史哲学的框架下对西方哲学传统中的实践理性进行革命性的转换,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理性概念。

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是对现代性进行批判、反思的理论,其通过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异化以及批判榨取工人的剩余价值来彰显其理论的张力。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在对实践、总体性、主体性的阐释与张扬中,基本承传了马克思哲学所蕴涵的实践品格、批判品格、人本关怀品格及辩证品格。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反思构成中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体内容,它以卢卡奇的物化理论为起点,以批判理论和《启蒙辩证法》为展开,以哈贝马斯的社会交往理论为转折,以异化、消

费、技术理性、大众文化批判为内容,对现代性展开了全面的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西方的社会是一个总体统治和总体异化的病态的社会,而不是一个和谐的社会。他们在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深刻、全面的批判的基础上,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解决现代性危机的社会主义结构模式。马尔库塞、哈贝马斯、卢卡奇、列斐伏尔等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分析、批判了社会产生异化现象的根源,并指出当代资本主义“文明”是一个病态的社会。卢卡奇、柯尔施和葛兰西在无产阶级革命实践、实践变革的现实作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等领域的见解都比较一致。但同时,西方马克思主义从批判古典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生产劳动异化到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消费文化异化这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后期发展的一个重要转向。而列斐伏尔的消费受控制社会批判理论、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社会批判理论以及哈贝马斯的公共生活领域理论,则是这个转向中的最重要代表。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等认为机器可以直接创造价值,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已过时了。<sup>②</sup>这样,马克思早期创立的异化劳动理论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现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万能钥匙。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形成与发展深受马克思主义和现代西方哲学的影响。

“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现代性的态度总的来说是一种辩证的态度。霍克海默、阿多诺注意到:当大众文化流行时,大众意识是被操纵的,革命的阶级意识将无法形成。于是,他们从人类文明的源头、以文化批判视角来研究物化范畴。通过对卢卡奇的物化范畴加以概括和改造,并在韦伯的工具理性概念框架下,霍克海默、阿多诺提出了工具理性批判思想,并以工具理性批判为内在逻辑而展开了对西方主体性文化的批判。在此基础上,他们结合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和工业社会的特点,在工具理性批判的视域下,将对西方主体性文化的批判深化为技术批判和大众文化批判的理论,他们从最初的经济批判发展到大众文化批判;由最初的激进思想批判转变为温和的思想探索。其中日常生活批判是他们理论变化中的一个重要的思想驿站。这些批判尽管充满着穿凿附会之处,具有某种程度的片面性,但

<sup>①</sup>桑明旭《批判逻辑的异轨与理论事实的遮蔽——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错误批判》,《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

<sup>②</sup>亚历克斯·卡利尼科斯、臧峰宇《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1年第5期。



无疑也具有极强的时效性和深刻性的一面,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日常生活批判和反思却依然没能走出学理性抽象的羁绊。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逻辑进程看,其文化批判理论本质上是逐渐远离现实革命的学术慰藉,这也使得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现实的批判力量大打折扣。<sup>①</sup>“西方马克思主义”把对现代性和现代化运动负面效应的批判变成了对社会主义价值目标追求的必然性的论证。

综上所述,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是从两个维度展开对现代的批判的:其一是将现代性理解为一种以反思性、批判性和革命性的表达,体现为时间维度的辩证发展过程,从而还原真实世界中的资本主义;其二是将人类形而上精神与现代性内在的自我否定、自我批判的力量相互结合,如此一来将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思想理路揭示得更加深刻和具体,体现为空间维度的辩证发展过程。这双重维度及其统一表征了现代性的批判精神与人类理性形而上精神的一致。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现代性批判其实质是一种“文化转向”,并且这种转向是自觉发生的,这种批判从最开始的也是最原始的暴力革命转变为更为隐蔽的制度性的总体性革命,且不再具备最初的暴力性质。文化转向批判使得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根本层面上揭示了其对现代性批判的实际意义,而且以深刻而敏锐的方式切入了20世纪的核心问题,即普遍的文化焦虑和文化危机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当代社会核心问题的关注凸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文情怀。这种情怀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提供了一定的合理性,但它宣扬抽象的人性论,提出难以实现的虚拟的社会主义改良道路和以文化意识革命为中心的变革战略。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学者不同程度地忽视了社会主义社会下的政治经济因素,抛弃了社会主义现实生活中的斗争,最终使它走向唯心主义。<sup>②</sup>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两种路向及其现代性批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提供了可能性。

### 三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适用路径

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

对资本主义社会反思和改良的结果,同时又是一种具有非马克思主义倾向的非正统马克思主义,他们对于当前社会的批判思维为中国化解决当前转型社会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提供了一个可以参考的窗口维度。我们应当明白,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中的合理精神对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有方法论的启示,我们应该承认其与马克思理论的联系。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有着时空间隔,从其理论构成、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立场、脱离实践的思想倾向、咬文嚼字的研究方式等综合考虑,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严格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存在一定的距离,需要我们在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把握自主意识和现实性的特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构建离不开对各种思想资源的吸收。在中西哲学的对话活动中,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其个性化和世界化的具体表现,势必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在接受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时需要批判性地借鉴吸收,需要总结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经验教训,更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方法,但最终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范式服务的。<sup>③</sup>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有合理性也有曲解之处,其合理性对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其曲解之处对于我国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则具有警惕意义,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关注,也凸显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在这种背景下,站在新的起点上以新的视角审视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落地、发展和创新过程中所面对的哲学困境——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的哲学悖论;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哲学维度缺失的原因;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主客体间关系,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代性问题等——就显得尤为重要。<sup>④</sup>本文认为,中国学者解决上述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将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中的有益部分用于中国构建现代化的和谐社会服务;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不同流派所产生的不同版块分别研究,汲取他们之中的合理成分,抛弃其“曲解”之处,从而为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提供新的血液和营养。

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原因有很多,除

<sup>①</sup>杨耕《当前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五个重大问题》,《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4年第4期。

<sup>②</sup>罗骞《马克思与现代性批判》,《江苏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

<sup>③</sup>王伟光《深入研究中国发展道路和发展经验,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

<sup>④</sup>史福伟《试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度契合》,《新疆社会科学》2014年第2期。

了中国自身具体实践的要求和苏联哲学教科书的僵化等原因外,西方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学术界本身。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西方学者构筑起了四种主流学术范式,即新时期的“历史主义论”、改革开放前史华慈的“异端论”、建国初费正清的“循环论”及过渡期的“中国中心论”这些主流的学术范式至今仍然影响到我们国内的相关学者。这一研究范式的转换反映出西方学者以极大的热情系统研究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对象、客观依据、实现机制等基本问题,形成了关于“化什么、什么化、怎么化”各个方面的基本观点。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化什么”,西方学者分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观点方法、列宁主义革命意识或斯大林主义极权政治;关于“什么化”,西方学者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的语言结构、文化形式、民族精神、历史条件、社会实践相结合;关于“怎么化”,西方学者考察了在日常工作中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现实相结合的具体形式。<sup>①</sup>在他们看来,中国以现代西方某些唯心主义哲学“补充”和“改造”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问题上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思想体系。它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人性的“复归”和人的自由解放,社会主义变革的途径只能是主观革命,无产阶级不能继续担当革命的主体。它反对暴力斗争,主张利用资产阶级政权所承认的合法手段,始终认为社会主义应采取“工人(厂)委员会”的模式。国内学者对此予以在反思和肃清,他们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对象上强调“四个分清”,在客观依据上认同的政治、经济、文化“三位一体”,在实现机制研究中侧重“五大环节”。还有学者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研究不但要回到马克思的文本,而且要回到现实的生活中从学术层面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诠释,这不仅关系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发展,也直接影响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sup>②</sup>因此,要解决中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所带来的问题及困惑,这就要求中西方学者突破“原著解读+历史叙述+政治评论”的传统研究模式,从专注于文本、史料的考证,转到立足当代人的生活实践,绝不能把研究范围仅局限于原先的“西方马克思

主义”,实现文本视野、历史视野和当代视野的深层次对话,有着从整体上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客观需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根本的目的不是要完善理论体系,而是要解决现实问题。”<sup>③</sup>它意味着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必须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流派和中国本土研究成果的相互“对话”,从而产生出真正符合中国当前国情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应秉承马克思主义传统,立足国内、国际两个实际,把握时代脉搏,凝炼人类理性精神,求解中国问题,拓展解题思路,力求构建适应时代发展的民族精神,担当起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提供理论支持的历史重任,<sup>④</sup>并对中国转型社会中出现的问题予以解决和引导,最终完成中国的现代化建设。

时代变革和科技发展向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一直在理论层面应对这个严峻的挑战。在如何推进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研究、如何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去解释现时代的变化、如何完善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体系、如何保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生命力等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可资借鉴的理论观点。尽管它在“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中有着这样或那样的“歪曲”和“偏离”,但是它的种种理论尝试充满了强烈的时代感,洋溢着一种理论的朝气,这种朝气为我们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强大的理论基础和可供借鉴的思想武器。当前,推动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汇通与融合,须打破学科壁垒,加强中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成果的对话与沟通。中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学理上具有共同的论域、共同的现实基础,而现实社会的全球化语境使二者具备汇通与融合的可能。双方的研究成果对于彼此而言所具有的互补性与融合性显得更为必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目的、研究重点取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现代化建设的实践需要,反思和汲取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路径,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具有启示意义。

(责任编辑:章克团)

①马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发展轨迹》,《学术月刊》2008年第3期。

②滕松艳《生活世界总体视域下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科学蕴含》,《齐鲁学刊》2014年第6期。

③张兴茂《作为实践过程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齐鲁学刊》2013年第3期。

④张雷《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代化的现实路径探析》,《徐州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